

● 宋明理学研究丛书

会通朱王： 朱熹与王阳明比较研究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编

张品端 主编



会通朱王： 朱熹与王阳明比较研究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编

张品端 主 编

袁鑫恣 副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通朱王:朱熹与王阳明比较研究/张品端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12
(宋明理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5-7206-1

I. ①会… II. ①张… III. ①朱熹(1130—1200)—哲学思想—研究 ②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4.75 ②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8571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薛鹏志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46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出版说明

“宋明理学研究丛书”是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组织各地学者研究宋明理学的成果而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

2005年10月,本中心成立以来,致力于收集整理宋明理学,特别是闽中理学的文化遗产,先后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有古籍整理、学者论集和个案研究专著等。组织出版“宋明理学研究丛书”,是本中心进一步加强研究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今后,我们将视财力情况,逐年组织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有计划地开展课题研究,然后将其研究成果,编入“宋明理学研究丛书”陆续出版,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系列学术著作的出版,展示本中心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同时为宋明理学研究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出版条件。

“宋明理学研究丛书”分设宋明理学家研究、理学著作研究、理学学派研究、宋明理学在海外研究等方面内容。出版包括专著、论文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等。

出版“宋明理学研究丛书”,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殷切期待并欢迎五湖四海贤哲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为丛书各辑的出版提供指导和帮助,共同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宋明理学研究中心

2012年6月

目 录

在“会通朱王,传承理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肖 铮/1
导 言	袁鑫恣/3
工夫论与做工夫	
——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	杜保瑞/5
从《朱子晚年定论》之辨看朱熹的明代影响	胡发贵/30
朱熹、王阳明对《大学》诠释之比较	张品端/39
理一分殊与朱王会通	李煌明/49
会通朱王如何可能	
——以《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解光宇 刘 艳/76
简述“格物”的解释史	
——以心物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何彦彤/85
论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成书的“缘起”	
——以正德九年发生在南京的一场“朱陆之辨”为中心	张宏敏/99
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共同点及其成因	
——以礼学为中心	王志阳/107
格物致知与至善之道	
——王阳明与朱子对《大学》“至善”与“格物”	
两条诠释的差异	李 旭/128
明初朱子学家吴康斋与朱子学向阳明学的过渡	邹建锋/143
论朱王两派道学大众化的异同	袁鑫恣/174

对朱王《大学》诠释的再检讨	盛 宁/186
简论程朱陆王之会通	丘山石/197
朱陆之间的明代崇仁学子及其思想	赖功欧 罗时刚/216
宋明儒学的内圣与外王	
——以“幽暗意识”为中心	徐 波/240
朱子与伊斯兰教·永春陈山岩题刻	
——泉州朱子文化二题	林振礼/253
以理节欲,以廉养心	
——朱熹理学的一种解读	宋冬梅/259
简论朱子学制度化的学术影响	邓庆平/267
试论朱熹“理一分殊”说的隐喻结构	张 寿/273
朱子晚年仁说新探	
——以《玉山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张新国/290
论朱子之理的“活动”问题	
——兼论朱子格物说	朱光磊/308
朱子之理深奥吗?	陈国代/324
论马一浮的书院文化教育	
——兼谈其对朱子教育之承袭	郑淑娟/333
略论王阳明南赣安民举措与“致良知”的关系	邹春生/348
王船山对王学良知说的批评	彭传华/358
生命心本体良知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及终极目标诠释	皇甫金石/374
王阳明对儒佛辨识之探析	黎晓铃/382
党性修养与知行合一	
——从王阳明学说中探寻加强党性修养的有效途径	冯国利/390
象山“先立乎其大”的哲学个性及其理论建构	黄玉秀/400
“性善”与“乐性”:黄道周“性命”之道的体认与实践	郑晨寅/411
理学与德勒兹	熊古思/422

在“会通朱王,传承理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7年11月4日)

◎ 肖 铮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嘉宾:

大家上午好!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中国朱子学会、江西省王阳明研究会共同举办,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宋明理学会讲——“会通朱王,传承理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朱子学的发祥地,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清新美丽的武夷学院隆重举行。这对于宋明理学研究来说,可谓是莫大的盛事。在这里,我谨代表武夷学院,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莅临学术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嘉宾们表示由衷的欢迎!

众所周知,武夷山地区是朱子学的发祥地。八百多年前,朱子在武夷山建书院,授徒讲学,著述立说,创立闽学。他的学说是宋明新儒学中理学集大成的思想体系。王阳明晚朱子三百多年后出生,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体系集宋明新儒学心学之大成。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东亚社会影响极大,直至当代,还是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子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经过陈淳、真德秀等门人和后学的阐发,朱子的心学思想得到不断发展。到了王阳明,他进一步发展了朱子的心学思想,在心与理、知与行、格物致知等方面均有重大创新,完成了心学体系的建构。今天,各位学者重新审视朱子学、阳明学,及其与当代文化复兴,由此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当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武夷学院地处朱子故里,是朱子八百年前创办武夷书院的传承者。目前,学校总占地面积3000多亩,湖光山色,山水俱佳,是一座美丽的校园。全日制在校生16000多人,专任教师730人(其中正副教授占40%),现有14个

教学院部，开设专业 41 个，学科优势突出。学校以朱子的“涵养穷索，致知力行”精神为校训，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积极培养并初步形成“传朱子理学，做武夷文章”的办学特色。现在，弘扬朱子文化，已成为武夷学院师生的共同使命。

朱子与王阳明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构建了理学、心学思想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大家相聚在这里，共同举办宋明理学会讲——“会通朱王，传承理学”学术研讨会，就是要吸收朱子学、阳明学思想中的精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文明进步而努力。

最后，我再次衷心祝福各位学者、嘉宾身体健康，在武夷山过得愉快！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导 言

◎ 袁鑫恣

2017年11月4日,题为“会通朱王”的会讲在武夷山市举行。本场会讲由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中国朱子学会、江西省王阳明研究会四家理学单位共同主办,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承办,与会者多半来自福建、浙江、江西这三片朱王研究的热土。加上上海、云南、山东、湖北、吉林等地,大家就朱王之间、理学心学之间能否会通、如何会通问题,畅所欲言。

什么是会讲?会讲是宋、元、明、清的理学家所习惯的聚众讲学,也就是学术研讨会、学者论坛。宋有朱张岳麓会讲、朱陆鹅湖会讲。也是在11月4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办了“纪念朱张会讲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武夷山是朱子讲学授徒、度过大半生之地,这次丁酉年武夷山会讲以“会讲”为名,是对理学传统的直接继承。

会讲提前收到论文30余篇,当天做报告的有21人。有人看到朱王的同多一些,有人看到朱王的异多一些,其中难免观点出入、碰撞之时。但正如明代理学家吕楠所言:“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哉。”

浙江大学董平先生的发言,阐明了宋明理学出现的思想史背景,特别是把它视为因应佛教而起的对中国文化本根的回归,却也因此程朱陆王无不糅入佛学元素。云南大学李煌明先生强调,朱子、王阳明是能够在“理一分殊”的框架里完成会通的——朱王之学,同构同源,此是理一;而分殊就是二者轻重不同,面貌各异。安徽大学解光宇先生说,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用朱子自己的话来证明王的学说没有乖离朱,已经开了会通朱、王的先河。浙江社科院张宏敏先生回顾了王阳明编辑《朱子晚年定论》的起因,这本书起于

正德九年(1514年)王阳明一门与宗朱的魏校一批人之间的朱陆之辨,王子编《朱子晚年定论》,原是为了表明自己与朱子一致,以此堵住宗朱派的嘴。

除了《朱子晚年定论》,四书之一的《大学》是朱王之辨的一大焦点。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张品端先生详细梳理了朱王对儒家经典《大学》的不同诠释,主要是三纲领中“亲民”与“新民”的不同,八条目中格致诚正解释的不同。浙江省社科院李旭先生从《大学》三纲八目的内在关联考察朱王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解释,认为二贤各有得失,朱子的格物说没有紧扣格致与诚意的关系,而阳明的格物说不合《大学》语境中的“至善”本义。上海大学盛宁女士认为,朱王对《大学》诠释的差异,一以天理为归宗,一以良知为归宗。两种路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统摄于下学上达这一儒学根本通路下的两种哲学诠释。好几位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武夷学院王志阳先生指出,朱子与阳明子即使在礼学方面也具有诸多共同点,二人均推崇礼学的作用,注重礼学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

找到一种兼有朱学和心学色彩的思想样本,是肯定朱王能够会通的好方法。几位学者就因此注意了明初的吴与弼及其崇仁学派。江西社科院赖功欧先生认为,江西崇仁学派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理学的思想光谱上,都介于朱子理学与王子心学之间。吴与弼兼采朱陆之长,启发了娄谅,娄谅又启发了王阳明。邹建锋从吴与弼的经学入手考察他的哲学,提出吴与弼的心性哲学相对于孔孟程朱具有多方面的发展,这种发展开启了明初朱子学向白沙与阳明心学的转化历程。

其他学者紧紧抓住理学这个主题,同样有不少精彩论述,其中朱子的天理概念、阳明的良知概念最是聚讼所在。一些学者谈陆象山、刘宗周、黄道周、马一浮等等,让人看到理学传统的纷繁与博大,同时也显示,谈理学就绕不开朱王。

尽管朱王同传孔孟圣学,同属理学,但在思想市场上,二人及其学说的确存在一定的此消彼长现象。21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主办单位介绍,这次武夷山宋明理学会讲,以及将来可能举办的第二期、第三期会讲,旨在助推两位大儒越来越多地会通起来,从而为实现儒家优秀文化的整体复兴服务。

工夫论与做工夫

——论王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理论合理性

◎ 杜保瑞

史上朱王之争,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可以说最后他以《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终结了这个争议,宗旨就是,朱熹晚年的论述立场已经与他完全一致,自己的儒学就是朱熹的儒学,两家毋庸争议了。就此而言,学界有若干讨论指称所编之朱熹文句其中有许多并非晚年之作,故而阳明的结论并不成立。笔者以为,朱熹文句的年代早晚问题并不重要,重点是为阳明所选编的朱熹文句究竟在什么意义下被阳明视为与己见相同?从而可以免去阳明对朱熹提出的许多理论上的攻击意见,例如批判朱熹为“理在心外”“析心与理为二”,且主“知行合一”,甚至是“先行后知”,而非“先知后行”之见等等。本文之作,将先疏解阳明所编朱熹文句的理论意旨,其次讨论该书之中的阳明及其弟子的评价意见,最终将指出,朱熹的工夫论与阳明的工夫论完全可以融合,因为真正的问题只是,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书中谈的是“要求做工夫”,而不是在谈“工夫论”,“工夫论”和“要求做工夫”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是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显然是把朱熹谈做工夫的话语视为与己意相同,这也就是说,阳明总是谈“要求做工夫”,虽然也谈工夫论中的本体工夫、工夫入手、境界工夫,但关键就是要做工夫,因此更会要求众人做工夫,而当朱熹谈“工夫次第”的工夫论时,阳明即批评其为“知而不行”,一旦朱熹检讨自己做工夫不得力而反省自责并立志实践时,阳明就觉得朱熹之意与己相同了。实际上,阳明想的是“要求做工夫”,朱王之间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工夫理论的绝大冲突,“要求做工夫”与“工夫理论”不是一回事,谁都会做工夫,做工夫就是反省、立志、改过这几件事,至于工夫论,朱王有不同重点,但也不可能有理论的

冲突,以为有重大冲突只是知识分子好胜争强的意气而已,理论上稍有方法论的分析能力者,都可以解消之。^①

一、王阳明究竟发现了什么朱子晚年定论

以下,笔者将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做通篇的解读,目标在指点出王阳明挑选的朱熹文字,都谈不上是什么工夫理论,而只是朱熹自己的反省自修,都是朱熹正在做工夫的句子,所以王阳明要的就是一个儒者必须要做工夫,并不是真的谈了什么不同于朱熹、程颐的新的儒学工夫论,以下论之。

《答黄直卿书》: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是向来定本之误。今幸见得,却烦勇革。不可苟避讥笑,却误人也。

朱熹对黄直卿说:“为学要立本,就是要立志,书中义理可以弄清楚,好好玩味,不必花力气去训诂考据,过去文本也会有误,但是,道理看明了,却不能耐烦于勇敢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不行的,硬撑,自以为是,不肯认错,这样也是误人。”朱熹这段文字,就是要人实践,这就是王阳明一贯的路数,也是陆象山的路数,并没有谈工夫理论,只是劝人去实践,也就是要求做工夫。

《答吕子约》:日用工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扰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伯,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相去远,不得面论;书问终说不尽,临风叹息而已。

朱熹要吕子约直接涵养本源,虽然文字工夫不可废,但日用之间的工夫更不可间断,这就是时刻反省,这样为官处事才不会与人争权夺利,因此,朱熹也反省自己有忘己逐物之病,也用了象山批评他的支离之病说自己,不过,象山讲的支离是指在义理文字上的工夫,而朱熹自谦的支离却是贪外虚内的修养之病,正是说得自己没有好好内反自修。引程颐的话,强调要自己安顿

^① 杜保瑞:《对王阳明批评朱熹的理论反省》,《台大哲学论评》第44期,2012年10月,第33~72页。

自己身心,就是要做工夫。

《答何叔京》:前此僭易拜稟博观之蔽,诚不自揆。乃蒙见是,何幸如此!然观来谕,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功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

朱熹开头就先自谦,自责之前的博观之弊。其实博观无弊,弊在不实践。然后就指出何叔京固然同意己说,却似乎未能落实,所以朱熹再函说明,关键就在“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也就是说,重点在于自觉,自觉之后要在日用之间去下工夫,否则,心上不自觉,光在研究义理,这不是圣学工夫,圣学工夫,“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必须得要在生活中实践,“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这个察,就几乎是程颢的识仁,察之即存守之,守此仁而已,也就是直接做工夫了。

以上这段文字,虽然朱熹自己批评书读太多、研究文义太多,却未及实行,但这并不表示:朱熹所研究的义理以及所提出的工夫理论是不正确的,只能说,这些形上学的理论以及工夫论的理论就是为了实践的依据以及实践的方法而研究的正确知见,只是还差了身体力行这一步。就像科学理论,没有在科技上应用,并不表示理论错误,更不表示理论无价值,只是要利用厚生的话,就要借由科技产品以为人类所使用。但普遍原理义上的科学理论,正是一切科技发明的依据,具有绝对的核心价值、关键地位,所以朱熹的形上学理论和下学上达以及求放心的工夫理论仍是正确的,而且,知了就是要行,要知得正确就是为了要行得正确,若未能行,等于白学了。朱熹并没有主张知而不学,但是在实践上却有反省自己学而未行,于是指责自己只是博观,却未在无间断中实下工夫。因此,被王阳明看重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就是朱熹指责自己没有好好在心地上用功的文字,也就是朱熹自己要求自己要做工夫,也就是笔者于本文宗旨上所明言的,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实际上就是谈“要求做工夫”,而不是谈了什么不一样的工夫理论,但王阳明却以为朱熹到了晚年开始讲了跟自己一样的工夫理论了。

《答潘叔昌》:示喻“天上无不识字的神仙”,此论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学得识字,却不曾学得上天,即不如且学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

学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间起看书，聊复遮眼，遇有会心处，时一喟然耳！

潘叔昌以“天上无不识字的神仙”比喻有科举功名的人没有学问不好的，所以必须好好做学问，不像有些人，读书不看仔细，任意解说，所以论中一偏之弊。基本上这个反省就是要强调读书识字搞学问，这正是朱熹擅长的武功。但朱熹自己却又做了反省，“上天”指的是各方面成功的人，关键就是真地去做，前说之弊是只知道人家有学问却不知道人家已经做足了工夫，“却不曾学得上天”，没有学到别人做工夫的辛劳，“即不如且学上天耳”，还是先做工夫把自己搞好吧，这个工夫就是念头的纯化、意志的坚定。这一步完成了，成了大人物，再去加强那些学问上的工夫，“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亦不妨也”。虽然如此，朱熹自己就是这种上得天了，而搞起学问的人，但是年纪越大，精力不从，读书又变得不是最重要的事了。“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不是记事时节”，就是说也不是博闻强记的年纪了，那怎么办呢？再度回到反省修心的工夫路上就对了，“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因为收敛身心，所以得力，得力是得在心上的笃定自信，对于价值感的坚定，所以“间起看书，聊复遮眼，遇有会心处，时一喟然耳！”心定了之后还是可以看书，看书贵在心领神会，有体会时，心下释然。

这一段谈话活生生地说出朱熹在要求自己做工夫，以及要求别人做工夫方面的准确话语，实际上王阳明所有对朱熹哲学理论的批评，都是以做工夫的要求来批判理论建构的活动，说朱熹“理在心外”，说朱熹“析心与理为二”，说朱熹割裂知行，就是对朱熹谈形上学理论的理气心性情说予以不做工夫的“理在心外”“心理为二”的批评，这当然是不准确的进路。又以“知行合一”的要求做工夫批评朱熹谈“先知后行”的“工夫次第论”，这同样是不准确的批评。就是王阳明自己所引的这一段文字，正显示朱熹完全是在王阳明要求做工夫的思路之中，只可惜，王阳明对朱熹的所有批评，却显示王阳明完全不进入朱熹的问题意识与思维世界。并不是朱熹晚年领悟与王阳明相同，而是朱熹对王阳明所谈的儒者就是要真切直接地做工夫的要求，自他为学之始，就是走在这条路上。只是朱熹的形上学理论之心性情理气说，工夫次第论之先知后行说，王阳明完全不能领会而已。

《答潘叔度》：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

不得；冥目静坐，却得收拾放心，决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看书鲜识之喻，诚然。然严霜大冻之中，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胜耳！

朱熹说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没法好好读书看文字，只好静坐沉思，却反而把自己的心念收拾得更好。此说，不能解为不读书光打坐时反而工夫才能做得好，而是要认识到朱熹平日努力看书做解就是为了知识分子有个好的义理知见的依据而做的努力。在做这样的学术事业的过程中，依然要回到本心时刻反省有无在待人处骄矜失礼之处，或是在做学问上投机懈怠之时，而这样的反思，却只能是在不读书不做学问而只是静坐反思时才更能专心检视。朱熹说：“颇恨盲废之不早也。”这只是文学手法，以书生之气的言语表示而已，当不得真。但是在“静坐”中，“收拾放心”却是直接收效，也是直接做工夫，做自己的修心工夫。王阳明会引此文，正是因为朱熹自己讲了要收拾放心的话，这就是要把胸中任何一丝杂念妄想除去的直接做工夫的话，然而，这样的话终朱熹一生都是会说的，至于形上原理与工夫次第和本体工夫的话，却是在读书讲明义理的状态下才写的文字，并不表示那些话不主张做工夫，而是那些话是关乎工夫理论以及它的普遍原理之依据。而王阳明是知道要直接做工夫亦要求弟子做工夫，因而在看到朱熹也讲自己做工夫的话语时便以之为与己同道者。

《与吕子约》：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

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知人事，知了人事就要去做人事，但是朱熹的读书又与一般的知人事是不同的，朱熹的读书是为了理论研究以及义理考证，让所谓的人事的道理被讲明清楚，所以需要有理气论的普遍原理以证性善论之为真，以及要有先知后行的工夫次第论使人的修养程途依序有据。但这些理论做得再多再好，一样自己要去实践，朱熹没有因为谈理论而不实践，实际是他谈的正是实践的目的与方向及方法的理论，他谈理论是按照学术进路来谈，他谈实践是自我要求地谈，亦即是直接在做工夫的状态下谈，即如本文，引孟子言及程子言都是讲要直接在心上做工夫，至于朱熹自己说的：“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是指为了科举功名而读书，为了较竞辩论而读书，不顾书中道理的实践，只顾意旨的讲究考索，这就是自己没做工夫了，

所以说“不知有己”，这样便是“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这样的书就是白读了，一位儒者就要行修齐治平之事业的人，若不在自己身心上做，这儒书自然是白读了，就算读得再好，可以中举，也与儒者气象无关了，所以说“亦何益于吾事邪？”其实，本段文字没有谈任何的工夫理论，而是说读书之后就是要去做的，也就是要求做工夫而已，而这正是这段文字被王阳明看上的关键。王阳明就是讲直接做工夫，朱熹此文也是讲不做工夫只读书是没用的，此旨，两人完全相同，实际上这种立场本来就是要相同的，朱熹注四书，目的就是告诉儒者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修养方式，道理既明就是去做，所以读书不是问题，没去做才是问题，此理不需一直强调，本来如是，朱熹偶尔强调，王阳明见得天下人多不能实践，故时时强调，甚至以为朱熹讲的工夫理论是析心与理为二、外理于心、割裂知行，这是阳明的错解，但阳明特别标出朱熹强调做工夫的话语以为朱熹晚年在学问上的意旨和自己相同，这是拆解朱熹，捍卫己说的做法，不是对朱熹的正确解读，若是阳明自己不对朱熹过度批评，而引用朱熹这些话语说朱熹自始即是与己相同，笔者以为，如此才是善解朱熹，同时也是理解朱熹哲学理论的专家，当然，阳明不解朱熹并不妨碍阳明自己仍为大家，但是他对朱熹有错解就是有错解，此点必须为朱熹澄清。

《与周叔谨》：应之甚恨未得相见，其为学规模次第如何？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应之盖尝学于两家，未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话扣之，因书谕及为幸也。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

大家都知道象山批评朱熹为支离，这个支离有两层的意思。其一为谈论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如理气心性情概念关系，以其分析地说，故指为支离，其实这是形上学普遍原理的讨论，目的在建立性善论以及成圣成贤的可能性，这是象山批评的主要脉络；其二为先知后行，这是朱熹诠释《大学》的工夫次第论，这是阳明以为朱熹支离的地方，以其不能知行合一，故为支离。可以说两家都是把朱熹的理建构当工夫实践活动来批评，以朱熹不直接做工夫，因此批评为支离。其实，就为人处事而言，朱熹岂有不做工夫？不做工夫何必用公于书册以定宗旨、以留下著作？这不都是为圣学而做的事功吗？做事功而无理想的坚持是不可能的，所以朱熹当然时刻在做工夫，亦即象山自谓

之易简。然而，此处朱熹自谓之支离者，实际上就是朱熹在做学问事功过程中对于自己的发心动念喜怒哀乐尚有不真切之处，自斥之为支离，所以说是“用功未切”，至于“减去文字工夫”，就是他的著书立说的事功稍停稍缓，让心思多在念头、动机、意志是非上打打转，这样就能“气象甚适”，朱熹又要人多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就是孟子要人做工夫兼及性善建构的地方，所以朱熹讲“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就是要在心上用功，管理体察自己的念头、动机、意志、喜怒等等，这还是要求做工夫，故为阳明所喜，然而，哪个儒者不做这样的工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即是，这是儒者本来该做的事，并不是朱熹讲了什么不做这些工夫的话，然后到了晚年再回头讲这些每个儒者都该做的事情的话。

《答陆象山》：熹衰病日侵，去年灾患亦不少，比来病躯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减，日甚一日，恐终非能久于世者。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

朱熹自称“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就是说，这几天一直用心于反省自己的行为，使得事事都得其条理，价值意识分明，没有进退得失之病。这段话，说得还是有做工夫，至于价值是什么？事功是什么？何为是何为非？这就是学问知识上的事情了，这就需要讲学究明，究明之后，拳守不失，时日既久，又或有失，那就再度反思究明。这也很合理，因为时间环境进度层次阶级都会改变，外部环境既变，处事应对之理就宜再度深究追问，所以就“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其实就是时时在心上自我提醒，就是做工夫了。

《答符复仲》：闻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又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见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

这段话也就是强调既然看到自己的行为是为利而为，那就把这个行为给舍去，而若是知有所该做的事，那就是好好持守，不要自己怀疑迷惑。这一段话都是讲就去做工夫的话语，跟王阳明平日教育子弟是同样的话语类型。

《答吕子约》：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尔。又闻讲授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